

臺灣故宮博物院所藏觀海堂舊藏 日本古鈔本《論語集解》之價值

高橋智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
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

提 要

臺灣故宮博物院所藏的觀海堂舊藏書，其價值已為人所知。但是，其藏書的重要部分——日本古鈔本的價值，則鮮受關注。其質量超越我們的想像，如果不查其藏書，根本不能了解古鈔本的歷史。古鈔本是日本室町時代（1336-1573）以前鈔的東西，即大概十六世紀以前的東西，在書誌學上的價值極高。因此，我們在此首先確認日本流傳的漢籍的歷史價值，然後再確認觀海堂舊藏書在文獻學上的價值，以開拓文獻學研究的新視野。

關鍵詞：論語集解、日本古鈔本、楊守敬、漢籍流通

前 言

眾所周知，圖書文獻和文化交流是同源一體，不可分割的。漢字文獻在中國大陸產生後，鄰國如何接受並加以發展呢？本文擬以日本相關的歷史為例，作簡要的說明，並在此基礎上探討臺灣故宮博物院所藏觀海堂舊藏日本古鈔本《論語集解》的價值。

清朝末年，駐日公使隨員、地理金石學者楊守敬（1839-1915）在日本收集了不少古籍善本帶回中國大陸，其中以日本古代鈔本和刊本為主。這批圖書現已輾轉入藏臺灣故宮博物院。也就是說，古代從中國大陸流傳到日本的漢字文獻，經由當時日本人重新鈔寫、刊刻，後來又重新傳回中國大陸，並進而轉到臺灣。

在這樣的流傳過程中，實際上涉及到古籍生產、古籍流通、古籍版本、古籍閱讀等許多複雜的圖書文化問題。因此，觀海堂的書不是簡單的善本藏書，我們可以說，它是圖書歷史、藏書歷史上非常有意義的文化財。下面我們以日本古鈔本《論語集解》為例，探討日本古鈔本的意義與楊氏藏書的價值。

首先對日本流傳漢籍的歷史作簡要的回顧。

第一章 日本流傳中國古籍之大概

壹、上古（十二世紀前）

1. 西元三世紀經朝鮮傳入的《論語》、《千字文》

漢字進入日本以前，古代民間有甚麼文字，很難研究。日本文獻上漢字文獻流傳的最初記載就是《古事記》、《日本書紀》（日本古代的歷史書）中的記錄：「應神天皇十六年，百濟國王仁來日，貢進《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應神天皇十六年是西曆285年，百濟國就是朝鮮古代國家（前18-660年）。王仁又叫和邇吉師。由此可知，中國的文獻是經由朝鮮傳到日本的。

2. 西元七、八世紀印刷術的傳入

印刷術之發明是中國文明最大的成功之一。據說，唐代已經開始雕版摹印之技術。民間所流行的曆日、陰陽、字書等，爲了廣泛流通，就在板片上雕刻，然後用墨和紙張印刷出來。現存最早有明確紀年的印刷品是咸通九年（868）刊刻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今藏英國國家博物館）。當然，在此之前，印刷術已經發達並流傳到朝鮮、日本。韓國最近發現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有人推定爲751年印刷的東西。日本現存最早的印刷品是《百萬塔陀羅尼經》，據說是764年開始印刷、770年完成的護國佛經經典。這些遺留至今的印刷品說明在西元七、八世紀，中國的印刷術已經傳到亞洲鄰國了。

3. 佛經經典、日本鈔本、早期刻本（奈良興福寺，京都寺廟）、日本留學和尚從中國大陸帶回來的經典（鈔本，宋刻本）

日本奈良時代（八世紀）爲佛教興隆的時代。在奈良的法相宗寺廟「興福寺」開始印刷佛經經典，叫春日版。至平安時代（八世紀末至十二世紀），除了奈良以外，在京都的寺廟（天臺宗、真言宗）也有開版事業。現存可知年代最早的佛

經是寬治二年（1088）刊刻的《成唯識論》，該版本現為正倉院所藏。

到了平安時代，即中國的唐五代時期，中國雖然政治動盪，但是，外出商船的活動卻依然頻繁。在永延二年（988）日本和尚寫的文章裏（釋延尋，伊豆走湯山緣起第五——據木宮泰彥著《日本古印刷文化史》），有「永觀元年（983）唐國本朝乃摺本寫本經論八千餘帙納之……」這樣的記述，可以為證。

另外，自唐代一直到北宋時期，很多日本和尚留學大陸，學習佛教和漢文，他們回國的時候，也常常把中國大陸的寫本、刊本帶回來。比如，僧空海（774-835）為早期的留唐僧，帶回不少密教的文獻（都是鈔本），設立真言宗寺廟（高野山、東寺等）。又如，裔然（938-1016）於北宋時期到中國，宋太宗賜予他大藏經（開寶藏）。這一蜀版大藏經現在流傳較少，在日本只有兩種，分藏南禪寺和書道博物館。他們帶回來的中國大陸版本引起日本覆刻、翻印佛經事業的發展。

貳、中世（至十六世紀）

1. 日本博士家（清原家、中原家等）鈔本、儒典流行

自平安時代末期到鎌倉時代（十二至十四世紀），佛教繼續流布，而儒教文獻也滲透到貴族學人中間。因此，仿中國大陸的制度在宮廷裏設立博士家的職位。當時主要有五家，即明經（專門研究儒教文獻的解釋）兩家和文章（研究文學）三家。就日本漢文學的發展來說，我們尤其應該瞭解明經兩家——即清原家和中原家的情況。

清原家的祖先始於何時，現已無考，其中有名的是清原賴業和清原教隆。賴業（1122-1189）確立家學的權威，專門研究《春秋左氏傳》，自寫課本傳給子孫。教隆（1199-1265）作為鎌倉幕府將軍的顧問，是幕府裏重要的武士北条實時（1224-1276）的老師，教授儒教的文獻，其中有「五經」、《論語》、《群書治要》等等。後來，北条實時收集宋代的刻本，創立金澤文庫，一直保存到現在。當時清原家的課本是鈔本，所根據的是宋刻本以前的古鈔本和傳自中國大陸的宋刻本，所以文獻價值特別高。

中原家的學問也一樣，可惜他們的資料遺留下來的很少。現在只能看到他們的課本《論語》（京都高山寺藏）。他們家的學問一直傳到江戶時代。

2. 學問之中心：日本寺廟。佛典、儒典的大量收集

從鎌倉時代（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到室町時代（十四世紀前半到十六世紀後半），日本漢學越來越發達。在日中貿易繁榮的情況下，宋代的文化陸續流入。日本和尚榮西（1141-1215）曾留學到宋，回國後傳「禪宗」，建立「建仁寺」。僧俊芴（1166-1227）也到中國留學，據說回來時帶來儒教書籍二百五十卷。另有曹洞宗開祖道元（1200-1253）建「永平寺」，圓爾（1202-1280）建「東福寺」等等。而且大陸過來的和尚在日本有影響的也相當多。道隆、普寧、祖元、一寧等都傳播教授宋代文化和圖書。因此，日本寺廟的地位比以前高了，輸入、開版，講學、收藏等主要圖書文化活動更多地在寺廟裏流行。由此可知，當時的日本寺廟已經成為學問的中心了。現在在建仁寺、東福寺等的倉庫裏，還能看見不少這些留存下來的圖書，可以想見當時寺廟學問的隆盛。

3. 大陸傳來的典籍：宋元刻本

榮西曾經跟朱熹學過是個象徵性的事情。此時，大陸「朱子學」非常熱門。以前日本博士家專門研究漢唐的訓詁學，但是他們覺得朱熹對經書的解釋新鮮而有趣，馬上就吸收到自己家傳的課本裏面。而且，日本和尚認為佛教跟朱子學也有相通的地方，於是以朱熹為中心的宋代的學問——宋學大受歡迎。在蘇東坡、黃山谷等文學家的作品中，含有佛教性的東西，所以當時的日本和尚喜歡念、講他們的詩歌。因而室町時代以流傳宋代文化為契機，成為接受宋元刻本最多的時代。

其實，流傳於日本的宋元版中國古籍主要有兩種：一是室町時代傳過來的，一是明治時代（十九世紀）以後來的。前者有個很明顯的特色，即書的版面上，滿紙都是當時日本和尚的批語；其中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日人接受漢字文獻情況的原貌。這是我們研究日本所藏中國古籍善本所應該特別注意的。

4. 日本製造的典籍：覆宋元明初刻本（五山版）、以日本傳統鈔本為底本用中國刻本校勘的鈔本（古鈔本）

仿南宋時代制度，日本政府亦定了五山寺廟，在京都足利氏幕府選了南禪寺、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在鎌倉北条氏選了建長寺、圓覺寺、壽福寺、淨智寺、淨明寺。以這些寺廟為中心，禪宗和尚開展了大量的學術活動：解釋經書，作漢詩文，講授宋元文學等等。日本文學史稱之為「五山文學」。其

中著名的有虎關師練、中巖圓月、義堂周信、月舟壽桂、萬裏周九等。五山和尚邀請中國大陸的和尚、刻工，跟他們學習研究儒教典籍、禪師語錄等。尤為重要的是五山禪僧受中國大陸來的老師的指導，自己出版中國經典和文集。書史上稱這些出版物為「五山版」。據川瀨一馬先生《五山版之研究》的統計，其中有佛經一百九十五種，儒教文學七十六種，其時代為鎌倉時代末期到室町時代後期，從中可見二百年間的日本圖書事業的面貌。川瀨博士還對「五山版」的價值作了明確的說明。比如說，《音注孟子》是根據南宋福建出版的纂圖互注之課本覆刻的，不僅本文內容比通行本好得多，而且其底本宋福建刻本也早已散佚了。所以，看到五山版《音注孟子》，就可以推見已經散佚的宋刻本的原貌。又比如說，《古文尚書》、《毛詩鄭箋》是根據日本古代以來流傳的博士家課本覆刻的。所以，按照五山版可以訂正通行本的本文註文的錯誤。

當然，刊本面世以後，除了和尚以外，貴族、武士等也可以購買這些書籍，藉以提高自己的教養。但由於當時的印刷數量有限（可能只有幾十部），知識人士往往只能自己設法努力鈔寫，這樣就有了不少寫本。現在日本流傳的十六世紀以前被鈔的古寫本（除了佛經以外）大概有九百多部；加上尚未發現的，已經散佚的，想來應該有幾千部鈔本吧。從這批寫本中我們可以推測甚麼樣的漢字文獻曾經在日本中世流傳過，並藉此探討日本中世學人接受中華文獻的情況，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5.以朝鮮傳來的活字印刷術（木活字）出版的典籍：慶長（1596-1614）、元和（1615-1623）時代的古活字本（據博士家鈔本和宋元刻本校勘的課本）

活字印刷文化，始自北宋時期畢昇（？-1052）發明的泥活字，後來又改造為木活字。現存西北發現的西夏文的活字印刷品說明十二世紀活字印刷術就已經傳達鄰國。到了元代改作金屬活字。明代活字印刷發達，採用銅活字，江蘇一帶銅活字印刷非常流行。當時，明朝和朝鮮交流繁盛，趁此機緣，活字印刷術大量傳播到朝鮮（一說朝鮮開始金屬活字印刷在宋代）。朝鮮亦信奉朱子學，在知識人士中需要漢字文獻的流行。較早的活字，如癸未字（1403年製造）、庚子字（1420年製造）等，至今仍有印刷品留存。

至十六世紀末，活字印刷術傳到日本，木活字印刷事業繁盛。此時日本學人越來越多，鈔本已不能滿足人們知識普及的要求，所以，活字印刷術非常受歡迎。日本書史上稱當時的印刷品為「古活字版」。上述川瀨一馬對此亦有研究，

著有《古活字版之研究》。此印刷事業，包括日本和尚解釋漢籍的文獻，差不多兩百多種漢籍（除了佛教、醫學方面的書籍），現存七八百部傳本流傳。慶長、元和時代以後，活字版基本上消失，日本重新開始了木板印刷事業。

古活字版之特徵是以清原家爲中心的博士家提供家裏的課本並據以印行，所以內容上受有古鈔本和宋元刻本的影響。實際上，這些課本的價值是非常高的。活字印刷種類比較多，現存版本也比較多，除了經部以外，史部、子部、集部類的版本都比較豐富。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日本學者認真校勘、讀書的態度。

參、近世（至十九世紀）

1. 學問的中心：大名（封建地主）之家、學校（藩校）

慶長八年（1603），德川家康創辦新政府，即江戶幕府，後成爲幕藩體制，即中央政府以幕府爲主，支配各地方的政府叫藩爲從，藩的主人叫大名。爲了鞏固幕府的力量，派遣德川家的親戚到重要的地方叫親藩，其他的大名叫外樣。德川家信奉朱子學，邀請林羅山爲大學頭（相當於翰林院學士），把朱子學定爲國學，開始了文治政治。因此，大名的權利不限於武力，還延及書物文化。在民間流行印刷文化的背景下，不僅幕府、大名收藏漢籍，他們創辦的學校（藩校）裏所採用的課本、學校裏的藏書，也越來越充實。有的大名喜歡圖書，收集善本，比如毛利家（在山口）、前田家（尊經閣）、市橋家（在滋賀）、鍋島家（在九州）等等。這些文庫至今大部分都保存著。由這些收藏情況來看，江戶時代的學問、藏書中心已在幕藩體制之中了。

2. 大陸傳來的典籍：明清刻本

日本學者大庭脩編有《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6）。唐船是中國大陸來的商業船。德川政府採用鎖國政策，當時只能在九州長崎出島跟外國接觸。所以大陸來的商船常到這裏來買賣東西。各藩的書物奉行（即管書的人）奉大名之命，在當地選擇善本跟他們商量價格。大庭脩的書介紹了當時輸入漢籍的種類和數量，據說主要是明清刻本。大名購買的基本上是常用的普通書。以日本內閣文庫（幕府舊藏的文庫）爲代表，現在我們在日本看到的明清刻本大部分是這個時代輸入的。應該注意的是，這些漢籍雖然刊刻年代是明清時期，但由於都是當時人的著作，其價值同樣很高。比如說，明刊本的明人文集，有相當一部分本子即使在中國大陸也已經很難得了。

又，大名喜歡珍奇之書，小說、插圖本、禁書等很少人重視的古籍也匯聚到他們的身邊。

3.日本刊印的典籍：翻明清刻本、日本刻本（和刻本）

江戶時代漢字文獻的受容，主要的讀者是中等的知識人，他們需要好看、好讀的書，因而十七世紀發展起來的古籍出版書店即以易讀、速印、廉價為目標刊印圖書。他們往往買到明清刻本以後，馬上請學者加上句讀點，趕快印行出版，賣給讀者。這個時代日本書店這樣出版的書叫和刻本。這些本子中雖然有不少簡略本，但像《天工開物》那樣中國大陸當時已經不傳的書也有。雖然對我們日本人來說，和刻本仍然是重要的出版文化史的遺物，但是刻本的內容與通行本已相差不多了。

4.後期有考證學，收入《四庫全書》之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

江戶時代亦為民間學者活躍的時代。中期以後（十八世紀以後）出現了有特色的儒家。其中尤以伊藤仁齋（1627-1705，古義派）、荻生徂徠（1666-1728，古文辭學）為著名。他們對漢籍的研究已不是內容大義而是古文字的確切含義，所以，對版本尤其關注。荻生的弟子山井鼎（1680-1728）專門研究古籍版本的文字問題，即校勘學，親自赴足利學校把通行本《七經孟子》和宋刻本對校，出版了校勘記《七經孟子考文》。大陸學人對這一著作感到吃驚，把它收入了《四庫全書》。後來，吉田篁墩（1745-1798）、山本北山（1752-1812）、片山兼山（1730-1782）等所謂的折衷學派（古學和朱子學的中間）出來了，進一步強調版本的必要性。江戶後期，市野迷庵（1765-1826）創立了以版本為中心的考證學。狩谷棧齋（1774-1835）、松崎慊堂（1770-1844）、小島寶素（1796-1848）、森立之（1806-1885）等民間的學者和醫學者研究版本，收集善本。《經籍訪古志》就是他們研究會的一種成果。清代末年，楊守敬來日本收集善本的時候，所參考的最重要的資料就是他們的成果。因此，從這樣歷史來看，日本近世漢籍流傳，可謂「從擴大開始到集萃」。

肆、近代（二十世紀後）

1.學問之中心：從中國學來的漢學家

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政府除保全德川幕府的藏書以外，把各藩的藏書加以調

查整理，編成《日本教育史資料》，有十多巨冊。但是，在政治形勢的影響下，輸入西洋文化的速度比較快，而對傳統漢籍文獻的收集則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而且封建社會的遺民（貴族、大名等）跟寺廟（明治政府作了廢佛動亂）爲了維持生活，陸續把藏書賣掉。比如，九条家（貴族，藏有宋刻本《後漢書》等）、伊達家（仙台藩大名），國清寺、三聖寺等等。有些流到市場上的古籍又被大陸來的學者買回去。

此時的日本漢學也改了性格。去大陸留學，學習現代漢語、吸收近代學問之粹的學者，從北京琉璃廠買回來善本。又，日本在大連建立滿鐵圖書館，在北京建立人文科學研究所，在上海建立東亞同文書院等，在當地收集善本的時候，產生了新的文獻學家。松崎鶴雄（1867-1949）、橋川時雄（1894-1982）、今關天彭（1882-1971）等，都是有特色的版本學者。

2. 中國文獻學家和日本學者的廣泛交流，《古逸叢書》等等

以楊守敬和森立之爲始，在近代出現了日本和中國大陸文獻學者特別密切的交流。此後又有王國維（1877-1927）和藤田豐八（1869-1929）、趙蔭棠（1893-1970）和永島榮一郎（1909-1978）等，這些都從一個側面展示了當時文獻、文化交流的情況。其結果是成就了《古逸叢書》這樣的事業。《古逸叢書》是楊氏把日本所藏的珍貴漢籍善本覆刻出版的叢書，其版刻工是日本名工。此真可謂文獻交流發展之極，日本所藏傳統漢籍的價值也由此被世人普遍認知了。

3. 各財團收集中國古籍（善本居多）：靜嘉堂文庫、東洋文庫、安田文庫、三井文庫

日本明治政府推進殖產興業，新興的企業家乘此機會發了財。其中，負擔基幹產業的公司尤其發達，他們後來經營銀行、商社，形成了財團，諸如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大倉、麻生，等等。當時的財團老闆除了發展經濟以外，亦致力於東洋傳統文化的保存和利用。他們創辦文庫、美術館、博物館等等，自己花錢收集一級文物，然後進行研究並公開展覽。其中收集善本較具特色的是三菱的靜嘉堂文庫。老闆岩崎家買到清代末年大藏書家陸心源（1834-1894）的一批藏書，其中宋刻本就有一百二十多種。岩崎家還建立了東洋文庫。安田原先是收集日本古鈔本、古刊本最多的，現在已經散掉了。三井文庫的特色則是拓本，敦煌的東西。由此可見，近代日本漢籍善本的流傳和保存因爲民間經濟力量發達、國際買賣交流而繁榮起來。

4.各研究所收集中國古籍（叢書居多）：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民間有錢人的買書活動是一項可見的文獻學術活動。一方面，認為從事學問的學者，爲了發展充實研究機構條件，收集常用的研究漢文資料。狩野直喜（1868-1947）、倉石武四郎（1897-1975）、吉川幸次郎（1904-1980）等把大陸藏書家的叢書買下來，爲京都、東京兩個東方研究所的基礎，現在發展爲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從以上簡略的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流傳漢籍的歷史，大致也可以善本藏書處的變遷作爲概括，這就是從上古的內府收藏，到中世的寺廟收藏，到近世的大名、藩校收藏，到近代的財團收藏。

第二章 觀海堂舊藏日本古鈔本《論語集解》的收集

壹、《論語》在日本流傳的歷史

在日本，魏何晏（190-249）所撰《論語集解》一直是流傳的課本。梁皇侃（488-545）的《論語義疏》雖然在大陸早已亡佚，但在日本民間也一直流傳著。此書原貌已不可見，但其影響非常之大。就現存資料來看，鎌倉時代，清原、中原家都據此作爲自己家寫本的底本；到了南北朝時代，清原家比中原家隆盛，故後來中原家的課本不流傳了。正平十九年（1364），根據清原家的課本刊刻出版了《論語集解》。除佛經以外的典籍裏，這是最早的木刻本，叫作《正平版論語》。後來，天文二年（1533）第二次出版《論語》，叫作《天文版論語》，所依據的也是清原家的課本。當時的主要讀者是寺廟的僧侶，他們努力鈔寫，形成一個個鈔本，於是室町時代流行的鈔本越來越多。但是，至十七世紀新的印刷技術興起以後，鈔本便讓位給木活字本、木板本了。

現存室町時代鈔寫的《論語集解》差不多就有一百部。考校這些鈔本的源流可以知道，當時的《論語集解》鈔本大致有三個系統：一個是根據清原家課本鈔出來的，一個是根據《正平版論語》鈔出來的，還有一個是參考《論語義疏》鈔出來的。

貳、楊守敬收集日本流傳漢籍之緣起

楊守敬（1839-1915，湖北宜都人）所購買收集的古籍是宋金元刊一級善本和日本古刊、古鈔本。其藏書上蓋了藏書印，即「飛青閣藏書印」、「星悟海外訪得秘笈」、「宜都楊氏藏書記」，每本書封面裏都黏上他自己七十歲照片。他本來研究金石、目錄、地理，有一定的成就。但是我們知道他最有名的成就是校刊《古逸叢書》。他於1880年（清光緒六年，日本明治十三年）受駐東京公使何如璋（1808-1891）的招聘來到日本，期間跟日本漢學家多有交往，驚嘆於日本流傳的漢籍的價值，盡力購買稀書，並選擇特級品把它覆刻出版。那時公使已經改為黎庶昌（1837-1897）。刻工是日本名工，叫木村嘉平，用木是日本櫻樹，用紙是日本上等美濃紙，其板片至今存藏在江蘇省揚州雕版博物館。

楊氏1884年回國後，在湖北黃岡任教，建築「鄰蘇園」，把他的藏書保存在那裏。其名由來是黃岡城北有蘇東坡所詠「赤壁賦」的地方。1895年其母親歸道山後，他開始點校從日本帶回來的古籍。到1901年夫人去世之前，已完成了《日本訪書志》和《留真譜》。當時他六十三歲，他再開始《水經注》的研究。其間曾受張之洞（1837-1909）的招聘到武昌，端方（1861-1911）的招聘到南京講課。1911年在上海遭遇辛亥革命。1914年受袁世凱（1859-1916）招聘，攜其藏書一起到京師，次年去世。身後其藏書由民國政府購買保存。1919年徐世昌（1855-1939）將其中的一部分分藏在松坡圖書館，1926年其主要藏書正式為故宮博物院所收藏。1933年起因防災搬遷，經過北平、上海、南京、重慶等地。1946年，故宮博物院編纂第一部楊氏藏書目錄《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由此可以瞭解楊氏藏書的大概情況。1948年，楊氏藏書的精華（總計一六六七部一五九〇六冊）被運至臺灣，1966年遷入臺北外雙溪新建的國立故宮博物院。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其後，日本書誌學者長澤規矩也寫過《楊星吾日本訪書考》，阿部隆一寫過《中國訪書志》等，對楊氏收集日本流傳漢籍的面貌加以揭示。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吳哲夫教授等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故宮圖書文獻選萃》等著書裏，也對楊氏善本的文獻價值作了研究。

楊氏的《日本訪書志》是對日本所藏中國已佚的二三一種漢籍所寫的題跋。總共十六卷，其中卷九、卷十是醫書。由於江戶後期的日本考證學者大部分為醫學家，故當時收集的善本中醫書比較多。該書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出版。

《留真譜》出版於1901年。「留真」一詞見於《漢書》卷五十三《河間獻王傳》，所謂「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該書採取版本學上前所未有的方式，以《日本訪書志》所著錄的版本爲主，將各種版本的卷端和牌記等木刻作爲版式的樣本，總計三九三種。這種方式成爲後來善本書影（諸如《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之類）的濫觴。

參、《日本訪書志》著錄之《論語》

《日本訪書志》共著錄《論語》四種：一、《論語集解》古鈔卷子，改摺（方本冊）分爲四冊；二、《監本論語集解》宋刻本；三、《論語集解》日本正平刊本；四、《論語註疏》元槧本。

在這四種本子中，第一種爲觀應元年（1350）鈔本，現藏臺灣故宮博物院。第二種爲宋建本，賣給李盛鐸，現存北京大學圖書館，最近《中華再造善本》已把它影印。第三種爲《古逸叢書》的底本，即爲單跋本。案，正平本《論語》計有四種版本：原刻本、覆刻雙跋本、單跋本（另有無跋本，和單跋本屬同一種版本的改修本）、明應八年（1499）本。現今收藏在臺灣故宮博物院的兩部楊氏舊藏都是無跋本。第四種爲元元貞二年（1296）刊本，現存情況不明。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藏有《元元貞新刊論語纂圖音義》一冊，和楊氏此一舊藏可能屬於同一種版本。

肆、《留真譜》初編、二編所載之《論語》

《留真譜》初編所載《論語》版本有十三種：一、江戶時代後期摹刻藤堂家藏貞和二年（1346）鈔本；二、貞和三年（1347）藤宗重跋，應永九年（1402）識語，鈔本；三、觀應元年（1350）跋鈔本；四、元龜二年（1571）跋鈔本；五、正平雙跋本；六、慶長刊本（覆刻古活字本）；七、日本南北朝時期古鈔本；八、天文刊本；九、宋刊《監本論語集解》；十、元元貞二年（1296）刊本；十一、室町時代鈔《論語義疏》；十二、寶德三年（1451）鈔《論語義疏》；十三、朝鮮本朱熹《論語或問》。

二編所載《論語》版本有五種：一、古鈔《論語集解》八行本；二、正平本；三、古鈔《論語集解》十一行本；四、古鈔《論語集解》九行本；五、古鈔本《論語集解》，天文二十年（1551）清原枝賢校本。

現分述如下：

初編一，摹刻本現在雖有流行，但是其底本從未有人見過。據說該鈔本是文章博士菅原道真（845-903）寫的，江戶時代津藩（現在的三重縣）學校有造館所藏。此摹刻本由有造館出版。

初編二，現由日本東洋文庫所藏。《經籍訪古志》著錄。楊氏訪書的時候，由向山黃村（藏書家，1826-1897）所藏。向山黃村的藏書非常精緻，與楊氏交往也多。人稱此本為宗重本，是現存日本早期《論語》鈔本中最早最好的鈔本。另外尚有文永五年（1268）、嘉元元年（1303）、正和四年（1315）、元應二年（1320）、嘉曆三年（1328）、建武四年（1337）等鈔本。

初編三，即《日本訪書志》著錄第一種。

初編四，現藏臺灣故宮博物院。屬於正平本系統。

初編五，正平雙跋覆刻本，楊氏舊藏未見此本。

初編六，慶長刊覆刻古活字本《論語》有兩種：京都要法寺刊本，覆刻要法寺本。此本可能屬後者。

初編七，可能與初編三為同一書。

初編八，天文二年（1533）刊本。此書的板片自開版以後一直保留到昭和時代，所以印本比較多。楊氏所收三本都是江戶時代的後印本。

初編九，即《日本訪書志》著錄第二種。

初編十，即《日本訪書志》著錄第四種。

初編十一，臺灣故宮博物院所藏。楊氏購得七種《論語義疏》鈔本，此本是由殘存卷一、卷四、卷七至八三種鈔本拼合起來的本子。

初編十二，日本御茶之水圖書館所藏。即先由漢學家島田篁邨所藏、後移至藏書家德富蘇峰收藏（成實堂文庫）的本子。有楊氏題跋，大概的意思如下：「日本《論語義疏》是本文、何晏注、疏，全部混在一起的本子。這是日本人所編纂的，原來肯定有單疏本，今亦不能見到原來的面貌」。楊氏的看法非常了不起。他說的是歷史上的事實。

初編十三，此本詳情不明。

二編一到四都是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本子，五爲東洋文庫所藏。二編一屬正平版系統，二編三屬清原家系統，四即參考《論語義疏》本。

以上爲《日本訪書志》、《留眞譜》所著錄的《論語》版本，觀海堂本著錄較此爲多。《留眞譜》對版本學的貢獻非常大，《日本訪書志》對中國學界影響也比較大。其價值，我們只要看看《論語》一書的情況就瞭解了。楊氏在古籍鑑定上的眼力、分析力，在中國藏書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第三章 觀海堂舊藏日本古鈔本《論語集解》之價值

壹、總說

楊氏從森立之、向山黃村、島田重禮（島田翰的父親，1838-1898）那裏，瞭解到日本中世以前漢籍流傳的諸如此類情況，便根據這些情況盡力購買古鈔本和古刊本，同時也收集早期流傳在日本的宋元刻本。他所搜購的日本鈔本，並不是隨便買的，而是按照歷史價值來收集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看觀海堂的鈔本，就可以知道日本漢籍的大致歷史，這是有道理的。楊氏《日本訪書志緣起》裏有如下之言：

庚辰來日本，……未知佚而存者為何本，乃日遊市上，凡板已毀壞者皆購之，不一年遂有三萬餘卷。……日本古鈔本以經部為最，經部之中又以《易》、《論語》為多，大抵根原於李唐或傳鈔於北宋，是我國所未見。……日本古鈔本經注多有虛字，阮元校刊記疑是彼國人妄增，今通觀其鈔本，乃知實沿於隋唐之遺。……日本文事盛於延喜、天平，當唐之中葉。厥後日尋干戈，至明啟禎間，德川氏秉政治，偃武修文。故自德川氏以前，可信其無偽作之弊。《古文孝經》固非真孔傳，然亦必司馬貞、劉子元所共議之本；《提要》疑是宋以後人偽作，未悉彼國情事也。……日本收藏家除足利官學外，以金澤文庫為最古，當我元明之間，今日流傳宋本大半是其所遺；次則養安院，當明之季世，亦多宋元本，且有朝鮮古本；此下則以近世狩穀望之求古樓為最富，雖其楓山官庫、昌平官學，所儲亦不及也。……日本醫員多博學，藏書亦醫員為多。喜多村氏，多紀氏，澀江氏，小島氏，森氏，皆醫員也，故醫籍尤收羅靡遺。……日本崇尚佛法，……高山寺、法隆寺二藏所儲唐經生書

佛經，不下萬卷；即經史古本，亦多出其中。……日本維新之際，頗欲廢漢學，故家舊藏幾於論斤估值，爾時販鬻於我土者不下數千萬卷……楊氏對日本流傳漢籍的理解程度，真是了不起。

貳、室町時代古鈔本《論語集解》的分類

日本南北朝時代以前的鈔本是非常少而且都是博士家用的課本，所以時代比較早；甚至有人認為，當時所根據的底本是宋刻本之前的本子。但是這種結論未免有一定的危險性，因為鈔本的源流並不是這麼簡單的；現在我們無法想像當時的具體情況。至於室町時代以後，做鈔本的知識人的活動還是比較清楚的。在某個寺廟裏，在東北足利學校等等他們學漢籍的地方，老師、學派之類的情況我們還是可以查得到的。因此，對室町時代的古鈔本《論語集解》，我們還是有可能把它們分類整理，考其源流。

大概十五世紀前期到十七世紀初鈔寫的《論語集解》，現在日本收藏的有一百部左右。楊氏收集了十部，占其中的10%，不僅種類完備，且有別處所不藏的本子。或許可以這樣說，如果看不到觀海堂的藏書，我們對古鈔本的研究可能還不至於如此深入。

現把這些本子分類如下：

一是清原家系統，一是正平本系統，一是《論語義疏》系統。

細而論之，清原家系統有四種：即清原宣賢（1475-1550）本系統、清原枝賢（1520-1590）本系統、卷首著錄章數的系統、卷首不著錄章數的系統（以下分別略作甲、乙、丙、丁）。正平本《論語》系統有兩種：影鈔的系統、傳鈔的系統（以下分別略作戊、己）。《論語義疏》系統有兩種：即卷首著錄章數的系統和卷首不著錄章數的系統（以下分別略作庚、辛）。

各類本子卷首的題式如下：

甲、論語學而第一 凡十六章 何晏集解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乙、同甲。

丙、同甲，「說」作「悅」。

丁、論語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戊、論語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己、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庚、論語卷第一 何晏集解

學而第一 (義疏混入)

辛、論語卷第一

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凡十六章

(義疏混入)

清原宣賢是室町時代日本漢學的泰斗，《春秋》、《尚書》、《毛詩》、《孟子》等等，從經部到子部，鈔寫、校訂、訓讀、解釋、講演，無所不用其力，看他寫的鈔本就知道其學問之精博。宣賢是京都吉田神社神官吉田兼俱（1435-1511）的第三個兒子，後為清原宗賢之養子。宣賢的兒子為良雄，宣賢的孫子為枝賢。宣賢第二子為吉田兼俱的兒子兼滿的養子，叫吉田兼右（1516-1573）。兼右的兒子有兩個，兄為兼見（1535-1610），弟為釋梵舜（1553-1632）。枝賢、吉田兼右、梵舜都繼承了宣賢的課本，但是，枝賢有一點改了宣賢課本的性格。兼右與梵舜的課本也是枝賢的系統的。他們家的學問，仍帶有中世的氣氛。自己的課本一般不對外公開，家裏的讀法秘密傳給兒子。我們只要看到他們家裏的課本，就可以知道當時人閱讀儒教典籍的情況。因此，作為中世學術研究的資料，清原家的鈔本是非常有價值的。他們家用的儒教課本都是以漢代的註釋為中心。到了江戶時代初期，受當時中國大陸朱子學的影響，大學頭林羅山發揚宋學的課本，於是熟識清原家課本的人越來越少了。

正平本《論語》出版的時候，最有幫助的是清原家，其課本當然有博士家的影響，但是流佈以後受到公家、僧侶、武士等很多人的歡迎。《論語義疏》系統的課本主要由僧侶傳鈔，從中可以看出寺廟裏學問之盛，同時也顯示出當時足利

學校的力量非常大。

因此，室町時代的鈔本，由現存《論語》傳本的實態來看，可以為我們提示很多東西，比如，當時知識層的閱讀情況、知識層的交流、校訂解釋的方法等等。

參、觀海堂舊藏《論語集解》之類屬

如上所述，楊氏是在對日本中世以前漢籍流傳情況有了相當瞭解的前提下收集漢籍的，所以他的收藏極具眼光。要證實楊氏在這方面的學問，我們只要考察一下他所購買的《論語集解》鈔本的情況就行。這裏先按上述分類將其所收集的《論語集解》鈔本列舉如下：

（一）丙類一種

A.單經本，天正四年（1576）鈔，十一行十七字，一冊。

（二）戊類三種

B.缺卷七、八，室町時代中期鈔，六行十三字，四冊。

C.存卷一、二，室町時代後期鈔，六行十三字，一冊。

D.元龜二年（1571）藤澤一寮鈔，6行13字，五冊。

（三）己類一種

E.室町時代後期鈔，八行十五字，三冊。

（四）庚類三種

F.永正十二年（1515）鈔，卷九、十享祿二年（1529）鈔，八行二十字，三冊。

G.無序，室町時代後期鈔，九行十六字，足利學校系統，五冊。

H.室町時代末期鈔，八行十八字，今出川藏書印，二冊。

（五）庚類變型二種

I.存卷一、二、九、十，室町時代後期鈔，七行十八字，林學齋舊藏，二冊。

J.室町時代後期鈔，九行二十字，足利學校系統，一冊。

總的來說，日本古鈔本《論語》的所有種類，在這十個傳本裏都能看到。尤其是第五種庚類變型的本子，非常有意義，都是其他機構沒有收藏的本子。也就是說，這些本子雖然屬於《論語義疏》系統，但實際上並不混入《義疏》的內容；很可能是先根據《義疏》混入本鈔下來，然後再把《義疏》注文去掉的一種本子。從這樣的課本可以看出室町時代後期的讀書情況。中期以後文本解釋的範圍越來越深，讀書人的知識程度已經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因而產生與原先不一樣的看法，開始喜歡比較簡單的課本，亦即解釋簡單、繙頁方便的本子。

如果沒有楊氏的這類藏書，我們對於這樣的變化或許難以瞭解。

室町時代的儒家是以清原博士為第一，學僧第二，武士也越來越有學問。而隨著時代的推移，三個知識層的交往日趨增多，他們的課本也附有更多自由性的性格，即博士家課本的秘密保守性越來越少。有錢的知識人希望把它印出來流布。慶長年間活字印的一批印刷品是這時流傳的文化遺產。

因此，從學問發展的歷史來看，室町時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楊氏收集的《論語》鈔本就很能說明箇中意義。

肆、觀海堂舊藏《論語集解》解題

（一）丙類

A.天正四年（1576）鈔本，一冊

封面（縱25.5、橫19.5釐米）白色，後補。單經本。首有何晏序。卷首題署如下：

論語學而第一 凡十六章 何晏集解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書式：四周單邊，有界，每半葉十一行，每行十七字，內框縱23.5、橫15.5釐米。楮紙。本文由同一人鈔就，訓讀為同時代所加。字體為室町時代典型的軟體字。有的卷首無「凡×章」、「何晏集解」諸字。本文內容屬於清原博士家課本的系統，但是訓讀方法有一點不是博士家的味道。卷末題作「論語卷第二」，後接鈔寫人的跋文：「天正四白 丙子 初冬七日不分烏焉馬任管公寫旃附與松

木善五郎殿了。」

藏書印有「向黃邨／珍藏印」（向山黃村）、「弘前醫官澀／江氏藏書記」（澀江抽齋）、「森／氏」（森立之）、「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楊守敬）、「教育部／點驗之章」、「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度點驗之章」。

《經籍訪古志》、《留眞譜二》著錄。

（二）戊類

B.室町中期鈔，缺卷七、八，四冊

封面（縱26.7、橫18.8釐米）係楊氏所補。每葉有襯紙，包角。原紙縱25.7釐米。首有何晏序，卷首題署如下：

論語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馬融／曰子（馬融以下爲注）

書式：無欄，無界，每半葉六行，每行十三字，字面高21.5釐米。楮紙。此本屬於正平本《論語》系統，係正平本的影鈔本。鈔寫時代較其他鈔本早，似鈔於文明年間（1469-1486），至晚爲文龜、永正年間（1501-1520）。訓讀係同時所加。卷末著錄經注字數，題作「論語卷第一 經一千四百七十字／注一千五百一十三字」。每冊末有「正／庵」印，署名「主正菊也」四字。

藏書印有「宜都／楊氏藏／書記」（白文）、「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教育部／點驗之章」、「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度點驗之章」。

諸目錄沒有著錄。

C.室町時代後期鈔，存卷一、二，一冊

封面（縱28.5、橫19.5釐米）紅色。這種封面是室町時代以前常用的；此本可能未經重裝，封面仍爲原裝。上書「魯論」二字。按，魯論是《論語》版本的一種。我們現在讀的《論語》就是這種版本。室町時代的知識人喜歡雅名，故作此題。首有何晏序，卷首題署如下：

論語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馬融／曰子（馬融以下爲注）

卷首題式同B本，內容也與B本一樣，屬正平本系統。

書式：四周單邊，有界，每半葉六行，每行十三字，內框縱22、橫15.1釐米。楮紙。墨筆訓讀、朱筆批均為室町時代所加。軟體字。有簡體字。卷末著錄經注字數，題為「論語卷第一 經一千四百七十字／注一千五百一十三字」。

藏書印有：「問津館」、「森氏」（以上森立之），「宜都／楊氏藏／書記」（白文），「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楊印／守敬」（白文），「教育部／點驗之章」、「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度點驗之章」。

諸目錄沒有著錄。

D.元龜二年（1571）藤澤一寮鈔，五冊

紅色封面（縱27.2、橫19釐米），封面較C本新。一般來說，時代越古封面的顏色越濃。上書「輅鐫卷第×」。按，「輅鐫」為《論語》別名，見於趙歧注《孟子》序。首有何晏序。卷首題署如下：

論語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九十六章（九當作凡，寫錯）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馬融／曰子（馬融以下為注）

書式：四周單邊，有界，每半葉六行，每行十三字，內框縱20.2、橫14.1釐米。按，正平本《論語》的版式即為每半葉六行，每行十三字，B、C、D本的款式均與此相同。紙張是混合楮、斐兩種樹木的材料製成。軟體字。內容屬正平本系統。卷末題署與C本同。無訓讀，偶有朱筆標點。每冊末有鈔書者即藤澤一寮的跋文，作「伊勢太神宮奉納全部／極門二十五代時江州阪田郡七條之生 藤澤一寮／元龜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藏書印為：「清住禪／院文庫」（某寺廟），「宜都／楊氏藏／書記」（白文），「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楊印／守敬」（白文），教育部／點驗之章」、「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度點驗之章」。

《留真譜》有著錄。

（三）己類

E.室町時代後期鈔，三冊

封面（縱27.3、橫19釐米）係江戶時代後補。首有何晏序，卷首題署如下：

論語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馬融曰子／者男子通（馬融以下爲注）

〈里仁〉篇以下不署章數。按，《論語》首句用「說」字爲清原家課本所特有，此本首句作「說」，而本文書式與正平版系統同，從中可以看到清原家本和正平版兩個系統的混合。

書式：四周單邊，有界，每半葉八行，每行十五字，內框縱22.1、橫15.5釐米。楮紙。本文由同一個人寫就，訓讀、朱筆批點則爲後人所加；又有別人寫的補說，引述《論語義疏》、《論語註疏》。末題「論語一之終 經一千四百七十字／注一千五百一十三字」，卷四、卷七至九不署經注字數。

藏書印有「弘前醫官澀／江氏藏書記」（澀江抽齋），「問津館」，「森氏」（以上森立之），「宜都／楊氏藏／書記」（白文），「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教育部／點驗之章」、「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度點驗之章」。

本書即《經籍訪古志》所載「容安書院所藏舊鈔本」（「容安書院」是澀江抽齋的書齋名）。《留眞譜二》著錄。

（四）庚類

F.永正十二年（1515）鈔，卷九至十享祿二年（1529）鈔，三冊

封面（縱24、橫17.4釐米）白色，係近代後補。何晏序附於卷二末。卷首題署如下：

論語卷第一 學而爲政 何晏集解

繼而附《論語義疏》中的一段文字：「學而第一 論語是此書總名學而爲第一篇別目／中間講說多分爲科段侃昔受師業自」，亦即總括〈學而篇〉一篇的意思。除卷九、十外，自第一到第十六篇，各篇首都有這樣的文字。本文開始如下：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馬融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王肅曰時（馬融以下爲注）

這是《論語義疏》系統鈔本的典型特徵。

此本卷九、卷十配以別的鈔本。其卷九卷首如下：

論語陽貨第十七 何晏集解

陽貨欲見孔子々々不見……

即沒有上舉卷一那樣的文字。所以，這部分的鈔本也可以說是博士家課本的系統。

書式：四周單邊，有界，每半葉八行，每行二十字，內框縱20.5、橫15.5釐米。楮紙。卷九、卷十書式、紙張同。訓讀、朱批當加於鈔本同時或稍後，墨批時代較晚（或即江戶時代），主要為校書，引用資料有「師曰」、「朱注大全」、「楸尾本」、「足利本」、「修善寺本」、「天授藏本」等。各卷末題「論語卷第一」等，惟卷九題作「論語卷之十八」。卷六、卷八末有鈔書人的跋語，文字如下：

永正拾貳年五月一日 付與（卷八「與」作「囑」）曇 宗穩。

可知此本的鈔寫時代是永正十二年（1515）。卷十末有補配鈔本的跋文，全文如下：

享祿第二戊丑臘月三日 依奧賢所望奉賀書之 七十五歲

不堪老暘慚愧々々注有不審不及私用捨任本書了。

仰後勘耳

由此可見卷九卷十的鈔書時代為享祿二年（1529）。另有一條跋文，為此本抄出之後，得到此本的讀書人於天正十七年（1589）寫的：

右此本修善寺中坊永運求之二十六歲讀之了。

授到大坊先住尊印禦房也

天正十七年庚寅彌生中旬

卷十末有收藏人的署名：「友樸館鳥山／雛嶽主人」。

藏書印有：「星吾海／外訪得／秘笈」、「宜都／楊氏藏／書記」（白文）、「楊印／守敬」（白文），「教育部／點驗之章」、「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度點驗之章」。

諸書目沒有著錄。為楊氏新發現的本子。

G.室町時代後期鈔，無序，足利學校系統，五冊

封面（縱25、橫17.5釐米）藍色，係後補。上書「圓珠 論語」。案，「圓珠」是《論語》的別名，見於《論語義疏》皇侃序，曰：「故言《論語》小而圓通，有如明珠；諸典大而偏用，譬如巨鏡。誠哉是言也！」此本無何晏序；按，這一系統的鈔本往往沒有何序。卷首題署如下：

論語卷第一 何晏集解

繼而注曰：

學而第一 論語是此書總名學而爲第一／篇別目中間講說多分爲科段

此爲《論語義疏》中的文字。本文開始如下：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馬融曰子者／男子通稱也（馬融以下爲注）

書式：四周單邊，有界，每半葉九行，每行十六字，內框縱17.5、橫13.5釐米。楮紙。分上下兩欄，上欄4.5釐米；足利學校本的書式都是這樣。上欄有讀者上課時所加的注文，引用其他的書。又，本文的訓讀也是足利學校的學生（即鈔書者）所加。這些閱讀的痕跡，是非常有用的資料，我們可以從中瞭解當時知識人的讀書情況。各卷末題「論語卷第×」。

藏書印有：「九雲」（白文），「法／得」，「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教育部／點驗之章」、「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度點驗之章」。

諸書目沒有著錄。爲楊氏新發現的本子。

H.室町末期鈔，今出川藏書，二冊

封面（縱26.4、橫19.5釐米）係江戶時代初期所加。卷首有何晏序。卷首題署如下：

論語卷第一 何晏集解

下有《論語義疏》中的一段文字，與G本同：

學而第一 論語是此書總名學而爲第一篇／別目中間講說多分爲科段侃昔

本文開始如下：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馬融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馬融以下爲注）

書式：四周單邊，有界，每半葉八行，每行十八字，內框縱18.7、橫13.2釐米。楮紙。分上下兩欄。上欄4.5釐米，沒有注文。本文附訓讀，時代與鈔書時代大致相同；間有朱筆批點。卷末題「論語卷第×」，卷十加注經注字數，題作「論語卷第十 經一千二百二十三字／注一千一百七十五字」。字小而用筆較輕，軟體，多簡體字。由字體、書式，可以推定為足利學校系統的鈔本，典型的室町時代末期的鈔本。

藏書印有「今出／川／藏書」，「星吾海／外訪得／秘笈」、「宜都／楊氏藏／書記」（白文），「教育部／點驗之章」、「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度點驗之章」。

諸書目沒有著錄。亦為楊氏新發現的本子。

（五）庚類變型

I.室町時代後期鈔，存卷一、二、九、十，林學齋舊藏，二冊

封面（縱28.7、橫19.7釐米）為江戶時代前期的紅色。原紙25.2釐米。襯紙較原紙大而新。有包角。首有何晏序。卷首題署如下：

論語卷之第一

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然卷二、卷十無「之」字，卷九無首題。次作：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馬融以下為注）

由題式來看，此本當與F、G、H本同源，亦即《論語義疏》系統的本子。但其卷首並無前引《義疏》中的文字。此本的意義上文已簡略說過，此不贅言。室町時代，儒家的書籍迅速流行，武士、學僧需要儘快學好讀完，在這樣的情況下，鈔本的系統容易發生變化。此本恰恰反映了這一時代潮流。

書式：四周單邊，有界，每半葉七行，每行十八字，內框縱21、橫14.3釐米。楮紙。有訓讀。卷一末題「論語卷第一終 經一千四百七十字／注一千五百一十字」；卷二無末題，卷九、卷十不署經注字數。字用筆較輕，簡體字多，可以推定其時代為天文、永祿時代（1532-1569）。

藏印有「溝東精舍」（林學齋），「星吾海／外訪得／秘笈」、「宜都／楊氏藏／書記」（白文）「楊印／守敬」（白文），「教育部／點驗之章」、「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度點驗之章」。又有朱筆的署名「持主明印」（第一冊末）和「明印」（第二冊末）。

諸書目沒有著錄。爲楊氏新發現的本子。

J.室町時代後期鈔，足利學校系統，一冊

封面（縱25、橫17.5釐米）係江戶時代後加。首有何晏序，另有皇侃《論語義疏》序。卷首題署如下：

論語卷第一 何晏集解

學而第一

跟I本一樣，此本亦屬《義疏》系統，但沒有《義疏》的注文，當是鈔書時省略的。此本的不同之處在於，後來讀書的人又再加上了《義疏》中的注文。《義疏》的注文可謂繁雜，當時的讀書人爲了要儘快讀完，省略注文；但實際上這些注文在學習中有時可能仍然很有用，故又在鈔本的空白處加上。所以從《論語》的閱讀歷史來看，I、J兩本真是珍貴，它們提供了相當有意思的史料。本文首行如下：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肅曰時

（馬融以下爲注）

書式：四周單邊，有界，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內框縱18.1、橫14.3釐米。楮紙。分上下兩欄，上欄3.8釐米。有室町時代的朱、墨訓讀。簡體字多，是典型的足利學校鈔本。另有江戶時代人的批，引用其他的書，譬如，「純曰」就是太宰春臺（日本儒家），「茂俛曰」就是荻生徂徠（日本儒家）。各卷末題「論語卷第×」。卷四、卷六末有後人所寫的跋語，其文如下：

「岩村（禱）眞（慎）助／如月和尚禦遺稿 全部三冊之內」（括弧內文字爲卷六所有）。

藏書印有「向黃邨／珍藏印」（向山黃村），「伊澤／信實」、「明誠堂／伊澤氏／藏書記」，「星吾海／外訪得／秘笈」、「宜都／楊氏藏／書記」（白文）、「楊

印／守敬」（白文），「教育部／點驗之章」、「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度點驗之章」。

諸書目沒有著錄。亦是楊氏新發現的本子。

結 語

以上簡要論述了日本流傳漢籍的大致情況，並以《論語集解》為個案，對楊氏觀海堂舊藏日本鈔本在文獻學上的價值作了探討。當然，楊氏的收藏並不僅限於《論語》，也不僅限於鈔本。但是窺一斑而見全貌，從他對《論語》本子的收集，就可以大致知道其藏書的整體面貌。如果對楊氏藏書（尤其是日本鈔本）作進一步深入的整理和研究，明瞭楊氏藏書的實態，不僅可以對版本變遷、文獻流傳等各種文獻學方面的問題有更多的瞭解，而且對探討閱讀對象、閱讀方式等書籍文化方面的問題，瞭解亞洲漢字文化圈的共通意識，開拓未來新的文明道路也必將具有重要的意義。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日本南北朝時代（1331-1392）刊本。
- (漢)毛亨傳，鄭玄箋，《毛詩鄭箋》，日本南北朝時代（1331-1392）刊本。
- (漢)趙岐注，《音注孟子》，日本南北朝時代（1331-1392）刊本。別有影印本，京都：羅振玉，民國初期。
- (清)黎庶昌等編，《古逸叢書》，東京，清光緒10年（1884）刊本，別有影印本，南京：廣陵書社，2002。
- (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清光緒23年（1897）刊本，收於《書目叢編》，臺北：廣文書局，1967。
- (清)楊守敬，《留真譜》，初編，清光緒27年（1901）刊本；二編，1917年刊本，均收於《書目五編》，臺北：廣文書局，1972。
- (日本)太安萬侶，《古事記》，東京：岩波書店，1958。
- (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江戶，享保年間（1716-1735）刊本。
- (日本)森立之等編，《經籍訪古志》，稿本，又有6卷補遺2卷，清光緒11年（1885）刊本。
- 不著撰人，《元元貞新刊論語纂圖音義》，平陽府，元元貞2年（1296）刊本。
- 袁同禮，《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1932。
- 瞿啓甲，《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1936年影印本，收於《書目五編》，臺北：廣文書局，1970。
- 中華再造善本編纂出版委員會，《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二、近代論著

- 大屋德城，《寧樂刊經史》，京都：内外出版，1923。
-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6。
- 川瀨一馬，《五山版の研究》，東京：ABAJ，1970。
- 川瀨一馬，《増補古活字版之研究》，東京：ABAJ，1967。
- 木宮泰彥，《日本古印刷文化史》，東京：富山房，1932。
- 文部省編，《日本教育史資料》，東京：文部省，1890-1892。
- 米山寅太郎，《中國印刷史》，東京：汲古書院，2005。

- 西村天囚，《日本宋學史》，大阪：杉本梁江堂，1909。
- 阿部隆一，《增訂中國訪書志》，東京：汲古書院，1983。
- 吉澤義則，《日本古刊書目》，東京：帝都出版社，1933。
-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39。
- 林泰輔，《論語年譜》，東京：大倉書店，1916。
- 長澤規矩也，〈楊星吾日本訪書考〉，收於所著《著作集》（二），東京：汲古書院，1982。
- 高田眞治，《日本儒學史》，東京：地人書館，1941。
- 高田眞治，《論語の文獻係註釋書》，東京：春陽堂書店，1937。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國立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圖書文獻選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
- 朝倉龜三，《日本古刻書史》，東京：國書刊行會，1909。
- 增田晴美編，《百萬塔陀羅尼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7。
- 藤塚鄰，《論語總說》，東京：國書刊行會，1949。

**The Value of the Old Japanese Transcripts of
Lun-yü Chi-chieh (Concentrated Expositions of the
Analects) from the Former Collection of the
Kuan-Hai Studio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wan**

Takahashi Satoshi
Institute of Oriental Classics
Keio University, Japan

Abstract

The value of the Kuan-Hai Studio collection of rare books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wan is well known. However,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ook collection — the value of old Japanese transcripts, is rarely paid attention to. Their quality exceeds our imagination. If we do not study this collection we will not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old transcripts. These old transcripts are transcripts of documents from before the Muromachi period (1336-1573), i.e. probably from before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y are of extraordinary value for the study of bibliography. Therefore we shall first determine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Chinese classics circulated in Japan. Then we shall determine the value of the Kuan-Hai Studio collection of rare books i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order to open up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Translated by Günter Whittome)

Keywords: *Lun-yü Chi-chieh*, old Japanese transcripts, Yang Shou-ching, circu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